

## 郑观应“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初探\*

吴光会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 “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形成于古代, 到近代被赋予了新的内容。郑观应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 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 他主张师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利用国际公法以夷约制夷的外交策略。其主张有一定积极作用。

关键词: 郑观应; 以夷制夷; 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5)04-0036-03

“以夷制夷”源于春秋时期“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 七雄并立, 苏秦、张仪更将其发展成为合纵连横之术。到了近代这一思想被加以引伸、发挥, 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但学术界对郑观应外交思想的研究却相当薄弱, 本文拟就这一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郑观应的一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重大屈辱事件, 深知外交须以实力作后盾, 而中国却缺乏这种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席平等地位, 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 他主张以“西学”增强外交的实力基础, 并借助传统的合纵连横之术, 结合西方的均势理论, 形成了独特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 一 师夷“制夷”的外交主张

郑观应出生于广东, 青年时期就弃举业习商贾, 长期与洋人接触, 使他能站在世界的高度洞察中国, 认识到中国“挨打”的原因是中国的落后, 因而主张突破陈规, 勇于向西方学习。值得注意的是, 他这里的“西学”已经突破了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的传统, 主张由器物到制度整套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体系的“西学”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 “夫欲制胜于人, 必尽知其成法, 而后能变通, 而后能克敌”,<sup>[1] 247</sup> 他把“西学”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

针对“西学为‘奇技淫巧’”之说, 郑观应批驳到: “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有益于国计民生, 非奇技淫巧之谓也”,<sup>[1] 273</sup> 并指出学“西学”并不可耻, 而“人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为减轻学习“西学”的阻力, 他采用了“西学同源”之说, 即把西方的先进事物说成是我国固有或窃自我国古代。他称: “今天下竟言洋学矣, 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法诸学, 无

一非暗袭中法而成, 第中国渐失其传, 而西域转存其旧, 穷原竟委, 未足深奇”;<sup>[1] 306</sup> 西方的议院制源于“《洪范》稽疑谋及庶人, 盘庚迁都咨于有众”;<sup>[1] 312</sup> 选举制“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 汉代行之, 得人称盛”。<sup>[1] 238</sup> 他认为, “诚使孔子生于今日, 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 亦必有所取焉”。<sup>[2] 167</sup> 总之, 学习西方只是“仿泰西, 复三代之法”, “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郑观应的“师夷”主张主要表现为:

#### 1. 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以制夷

郑观应的鸿篇巨著《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 无处不流露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称赞和向往。他说: “由今之道, 变今之俗, 宜览往古, 法自然, 谏远情, 师长技, 攻其所短, 而夺其所恃”,<sup>[2] 61</sup> 认为西方的学问“萃数国之人才, 穷百年之智力, 擲亿万之资财, 而后得之”, 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 是国家富强以“制夷”的捷径。即“泰西轮船、机器、火炮之精, 泄天地造化之奇, 为军国所利用, 以此致强, 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 势必雄跨四海。”<sup>[3] 52</sup> 他还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例证明先进技术的优越性, “尝闻德、法构兵时, 德所以胜法者, 非德兵果精于法兵, 亦藉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sup>[2] 79</sup> 日本也因“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 凡外来货物, 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 招商集股, 设局制造, 一切听商自主, 有保护而绝侵挠”,<sup>[1] 591</sup> 并强调: 日本自然及人文条件都不如中国, 如果中国仿效日本学习欧美变法维新, 那么中国超过日本“犹反手耳”。

#### 2. 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制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中国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是封建专制制度, 因此, 改革政治制度是中国从贫弱转向富强的必由之路。郑观应对此有清晰的认识: “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 而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焉”, 西人“育才于学堂, 论政于议院, 君民一体, 上下

\* 收稿日期: 2005-03-22

作者简介: 吴光会(1977-), 女, 四川成都人,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sup>[4]234</sup>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即使“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也不足恃。他强调“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sup>[5]11</sup>郑观应主张“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他说“惟有取世界共同认定之立宪政体以移之于我国而已。”<sup>[9]299</sup>

郑观应特别推崇西方的教育制度,他说“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sup>[1]267</sup>“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材。”<sup>[1]626</sup>通过培养有用人才增强实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在外交中取胜。即所谓“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sup>[1]267</sup>

## 二 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的策略

西方列强在争夺中国问题上关系复杂矛盾重重,郑观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主张在中国实力不如人的背景下,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联合部分列强牵制打击另一部分列强的“以夷制夷”策略。

### 1. 强调中英联盟以制俄日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度,列强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和掠夺更为加剧,中国面临鸦片战争以来的更大危机。郑观应分析时局,对列强觊觎中国深表忧虑:“年来日本讲究水师……其志叵测,恐终为中国边患。俄、英、法三国属地,铁路将筑至中土,托名商务,意在并吞。倘俄法合力侵犯,水陆并进,南北夹攻,恐西人之大欲不在赔费,而在得地矣!俄、法有事,英、德、美、日必以屯兵保护商人、教士为名,亦分占通商各口,后患之来不堪设想!”<sup>[1]760</sup>但是,中国不是群雄的对手,所以,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保全自己。他针对沙俄的凶悍:“咸丰八年,乘中国方有兵事,据我乌苏里江之地五千里,诳占我沿边卡伦以外之地万余里……近来造西伯利亚铁路,由彼得罗堡直达琿春……倘西伯利亚铁路造成,则由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间。”<sup>[1]74-75</sup>强调“防俄宜先”。

80年代初,沙俄积极推行远东政策,日本更迫不及待实施其北进计划,朝鲜问题遂成为远东国际问题的焦点,也是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但中国无力与俄国、日本抗衡。据此,郑观应提出了中英联盟以制俄日的策略,“为今之计,独力当俄、日之狡谋,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锋锐,此连横之策不可不讲也。”<sup>[1]778</sup>但到底与谁联合呢?郑观应明确的看到,此时英俄之间的矛盾,“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并朝鲜,东得志于亚洲,西必横行欧土。势同东帝,浸假而进

窥印度,亦英人所深忌。”同时,英日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日人得志于朝鲜,亦非英所乐闻,岂有不交中国以保朝鲜,而反助俄、日之理乎?”<sup>[1]778</sup>“日本尝自称东方复出一英国,此言实深中英人之忌,决不愿其坐致强大也必矣。然则朝鲜之存亡,亦英国盛衰之所系也。”<sup>[1]779</sup>所以,郑观应主张中、英结盟与俄、日形成势均力敌之势,使俄、日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

### 2. 主张联俄以制英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郑观应联英防俄的设想全面落空,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今中国为日本所侮,更为泰西各国所轻,皆知我兵将之弱,军器之窳,国库之空,汉奸之众,吏治之坏,民心之涣。莫不狡焉思逞,蚕食狼吞”,<sup>[7]924</sup>“中国屏藩尽撤,俄瞰于北,英瞰于西,法腾于南,日耽于东,且英、法、美、德、俄、日先后向中国皆索有租界,为侵占之先机。”<sup>[1]801</sup>面对瓜分豆剖的局面,郑观应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方今俄与英、美、普、法、澳、日诸国,争逐海上,何殊战国七雄。论者谓:俄据形胜之地,逞强富之雄,辟土开疆,励精图治,则秦之连横也。英、美、普、法、澳、日诸国,立约要盟,练兵修政,悉意备俄,则六国之合纵也”<sup>[2]66</sup>。此时,郑观应为俄国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行动所迷惑,认为俄国“仗义执言”,“其(俄)欲我振兴,得以互相维系”。对英美支持日本是怒不可遏,加之“英之商务实朕我膏脂”,据此认为,“今日时局之可忧,而亟宜措意者,恐不在俄而在英。”<sup>[1]797</sup>因而主张“结俄以为援,亲俄以自固。”<sup>[1]810</sup>他还认为中、俄相联,日人必然会害怕转而亲我,有利于制英,“中、俄既亲,我又能变法自强,互相保护。中、俄、日可也为婚姻之国,合力以驱逐英、法、荷,占据印度,索还暹罗、缅甸、越南、南洋各岛。”<sup>[1]798</sup>当然,这里的联俄并不是亲俄,而是利用“英俄相忌复相制”的矛盾关系,最终以制俄,“亲俄正所以饵俄”。<sup>[1]831</sup>

### 3. 提倡多国大联合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郑观应的认识也发生极大的变化,八国联军侵华后,面对强邻环伺,他又提出多国联合的主张,“亟宜与俄、德、美联盟,许以开矿、借款、铁路之利。不可仅与俄联,恐为所陷也。”<sup>[1]782</sup>

俄国占领旅顺、大连并图谋占领东三省后,郑观应提出“结英拒俄”并主张争取更多的援助,就是要联合英、日、美,以与俄、德、法形成均势。他分析道:“今我国当创巨痛深之会,法、德皆为俄助,美、英尚中立无他,惟日人仗义执言,商同各国迫俄人还我辽东请作万国通商之地,又极力保全大内宫殿,禁止兵弁杀戮,闻八国之兵入京津,不杀害官绅者只日、美耳。”<sup>[1]827-828</sup>“甲午役竣,彼(日本)亦深悔自伤同气……故年来弃瑕释嫌,出肺肝以与华人相语,颇愿联络我豪杰之士,欲为异国缓急之图”,<sup>[1]826</sup>“美国秉性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力

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sup>[2]114</sup>所以日、美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而且“英、美有同类相连之谊,而日、英又素有联盟之雅。是我苟极力与日交欢,即可由渐推挽,而与英、美联盟。”<sup>[1]828</sup>如果中、英、美、日四国联盟,足以抗衡俄国,保住东方太平之大局。

### 三 以“夷约”制夷

国际法旧称“万国公法”,作为通用于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它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法律规则的总体,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国际法产生为各国带来了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鸦片战争以后,国际法知识被译介到中国,这在近代中国国权日削、国土日蹙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对郑观应影响甚大。郑观应认为,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规范,中国作为衰弱之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根据公法以夷制夷,尽量减少所受之害,维护国家权利,即以“夷约”制夷。因此,他主张“交涉之事万不能从者即执条约公法以理拒之,不可迁就以遗后患”,<sup>[9]376</sup>对违背公法的行为,他主张各国共同声讨,“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者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sup>[2]67</sup>为此,他建议修改中国的法律以适应国际社会,“况欧洲列强,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sup>[2]66</sup>最终起到“制夷”的作用。

郑观应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关系急剧变革的时代,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他在提出合众联横的时候,始终以“西学”加强本国实力为前提,“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sup>[1]301</sup>并以普鲁士为例,证明只有国家富强才可能得到他国的援助:普鲁士富强了才迎来了1813年联合俄国、奥地利军队败法兵于积城,1815年与英兵联合大败拿破仑。这较之当时统治者纯粹依赖列强而苟且偷生高出了一筹,而且也为中国的自强发展指明了方向。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制人,而不制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制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

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sup>[8]70</sup>

其次,“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符合利用矛盾,相互牵制,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这一策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效果。比如,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遏止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等。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一策略仍有积极意义。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局部动荡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亡我之不死,妄图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大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夷学来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对有不良企图的列强采取多种方式以制夷。

当然,郑观应“以夷制夷”的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看到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认清列强在侵华问题上的一致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sup>[9]283</sup>

####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盛世危言[A]. 郑观应集(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2] 夏东元. 易言三十六篇本[A]. 郑观应集(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3] 夏东元. 救时揭要[A]. 郑观应集(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4] 夏东元. 盛世危言自序[A]. 郑观应集(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5] 夏东元. 盛世危言后编自序[A]. 郑观应集(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6] 夏东元. 盛世危言后编[A]. 郑观应集(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7] 夏东元. 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A]. 郑观应集(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8] 梁启超. 李鸿章——中国四十年大事记[M]. 上海: 上海书局出版社, 1935.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责任编辑 白云]

## On Zheng Guanying's Diplomatic Theory of "Play One Barbarian State Against Another"

WU Guang-hui

(Department of History,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theory of "play one barbarian state against another" come into being in the ancients, up to the latter days, the theory was endowed with new content. The reformer and ideologist Zheng Guanying was the exponential. He thought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enemy was mightiness and we were infirmness, We must constitute an available policy in order to stay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Therefore, He claimed to learn from the others then restrict them; use other countries' contradiction to restrict them; us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to restrict them. His theory was functioning.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play one barbarian state against another"; diplomatic theory